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历史诗学

【俄】维谢洛夫斯基 著

刘宁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历史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俄】维谢洛夫斯基 著

刘宁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诗学 / (俄)维谢洛夫斯基著;刘宁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10-0

I. 历... II. ①维...②刘... III. 文艺理论
IV. I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18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46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30.00 元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冯 至 叶水夫 王佐良 陆梅林

主 编: 陈 癸

副主编: 郭家申 谭立德

编 委: 王道乾 王逢振 邓光东 白 烨

朱 虹 刘 宁 刘硕良 吕同六

吴元迈 李光鉴 李辉凡 张 羽

张 玲 张 捷 张 黎 余顺尧

陈 癸 胡其鼎 陆建德 郭宏安

郭家申 闻树国 袁可嘉 夏 玫

夏仲翼 钱中文 黄宝生 章国锋

董衡巽 韩耀成 谭立德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本书责任编辑: 陈 癸

简介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院士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创始人,其代表作《历史诗学》(1870—1906),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和方法论。他对文艺的起源、文学的样式和体裁的形成和演变,情节史、修饰语史,以及诗歌语言风格、对比手法等一系列诗学基本问题的范畴进行了追根溯源,鞭辟入里的系统分析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开拓性的创见,开辟了一条“从诗的历史中阐明诗的本质”,从而把文学史的研究和诗学理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文艺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道路。近几十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在东西方的复兴和推进,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探讨。以多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著名的美国批评家韦勒克认为:“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比较文学的庇护者和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位首倡者”,他“为文学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直至20世纪才引起重视”。俄国20世纪以来,许多不同倾向的文艺学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在内,都从他的学术遗产中获得营养和启迪。

维谢洛夫斯基生前只发表了《历史诗学》的部分章节。全

书直至1940年才在苏联列宁格勒出了第一版,由日尔蒙斯基编注并作序。由于该书包括了大量作者生前未发表的讲稿、笔记、提纲、学术考察报告等,篇幅浩繁,内容艰深,不适于一般读者阅读,此后一直未能再版。苏联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历史诗学》的新版,作为向高校学生推荐的“文学学术名著丛书”之一。该书依据1940年的初版,删繁就简,以作者生前发表过的历史诗学章节为主,作为附录收入了部分手稿,并附有比较详尽的注释。我们就是根据这一新版本,将维谢洛夫斯基这一经典学术著作译介给我国读者的。

译者前言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述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А. Н. ВЕСЕЛОВСКИЙ, 1838—1906)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历史诗学研究的创始人,被公认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他把这门学的研究推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近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维谢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历史诗学》(1870—1906)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和方法论,确定了世界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思想,提出了以历史比较方法为依据,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史料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体系的任务。虽然他毕生研究也未能完成这一宏伟任务,但他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和方法却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谢洛夫斯基逝世近一个世纪以来,他的学说虽一再遭到曲解和磨难,却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许多不同倾向的文艺学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在内,都从他的学术遗产中获得营养和启迪。正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弗·费·希什马辽夫所说,“我们经常运用现成的思想和原理,有时

HA92/03

甚至完全不了解或者忘记了这些思想和原理都源自维谢洛夫斯基”。^① 日尔蒙斯基、普洛普、巴赫金、利哈乔夫、康拉德、洛特曼、梅列金斯基等俄苏文艺学家继承和发展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学说,在历史诗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其中如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狂欢化”、对话性等诗学理论更成为了东西方学术界常说常新、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维谢洛夫斯基提出的建立历史诗学的任务和方法受到了俄苏文艺学界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已成为苏联科学院下设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等研究机构的“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科研方向之一”。^②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位跨世纪的文化巨人在沟通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文化传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建构科学的世界文学史的宏伟蓝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拟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作一简要评述。

一、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生涯

维谢洛夫斯基的世界观、文艺观形成于19世纪中叶,而他的学术活动则贯穿于整个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俄国文艺学中新兴的学院派十分活跃,取得了一系列引起西欧学术界注目的富于开拓性的学术成果。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神话学派的布斯拉耶夫,文化历史学派的贝平、吉洪拉沃夫,比较历史学派的维谢洛夫斯基,心理学派的波捷勃尼亚、奥

① 见《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分部通报》,1938年第4期,第39页。

② 格·别尔德尼科夫:《荣获各民族友谊勋章的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载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苏联文学》,1985年第4期。

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等)大都在俄国一些著名大学执掌语文学、文艺学和文学史等课程的教席,并先后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他们学识渊博,站在俄国和西欧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文艺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他们力求把文艺学的研究和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革新文学观念和文艺学的方法论,从不同视角探讨文艺发展和文学创作的规律。为此,他们都很重视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古代文学,以及人种学、民俗学、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证等实证性的研究。

维谢洛夫斯基被公认为俄国学院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俄国文艺学派的典型特征和优良传统。他学贯东西,视野开阔,既具有深厚的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文化的底蕴,又对西欧哲学美学和语文学各派的学说有精深的研究,并能博采众说,熔于一炉。他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的年代(1855—1859),正值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同“纯艺术论”者和斯拉夫主义者在报刊杂志上就俄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年轻学者深受这场探索科学的、革命的真理的“杂志气氛”的熏陶。他参加了当时的一个进步学生小组,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维谢洛夫斯基日后回忆起六十年代的杂志论战对于像贝平等他们这一代学院派学者的世界观形成所起的深刻影响时,曾说:“这是一个充满不安的期待和玫瑰色的希望,又过渡到各种要求的年代;在旧事物的间断之中产生着新事物;四十年代的人们期待着让位于更深刻、更热忱地看待社

会革新问题的六十年代的年轻人。”^①维谢洛夫斯基的同情显然是在“同自由主义的唯美派老爷们组成的旧党”展开不调和斗争的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边。尽管他和贝平等其他学院派的进步学者一样,在政治上从未属于激进的革命民主派阵营。

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赖于他对俄国和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神话学派、历史化学派等在文艺学、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吸收。他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师承俄国神话学派的创始人布斯拉耶夫教授,培养了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传说和俄国民间文学、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和注重史料收集、考证的严谨学风。但他对于德国学者格林兄弟的神话学理论持批判态度,拒不接受关于诗歌的永恒不变的雅利安起源的假说,认为文学“首先要表现民族的内容”,但民族性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着的现象。因此,他一开始从事学术活动,就认为历史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有不少优于神话学派之处,应兼收并蓄两派之所长。

大学毕业之后,维谢洛夫斯基数次赴西欧各国考察,极大地扩大了学术文化视野。他在德国考察期间,深入钻研了德国古代和中世纪文学以及拉丁语系语言学,成为了俄国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日后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在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首次创立了拉丁-日耳曼语文专业。他在布拉格等地考察期间,又深入地研究了斯拉夫各族的民间文学、古代文学和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文化史,成为了国际公认的第一流斯拉夫学专

① 转引自《俄国文艺学中的学院派》,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05页。

家。他在意大利考察期间,深入研究了意大利的语言文学,尤其是以意大利为发源地的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欧文化运动,运用历史文化学的观点方法写出了关于文艺复兴起源研究的专著《阿尔贝蒂的别墅》(1870年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在莫斯科大学答辩通过),使他赢得了全欧的学术声誉。

维谢洛夫斯基于1870年结束了在国外的长期考察,回国后应聘在彼得堡大学首次开出了总体文学史课程,随后又陆续开出了西欧文学史、拉丁-日耳曼语文学、历史诗学等课程。1872年他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斯拉夫人关于所罗门和基托弗拉斯的故事与西方关于莫罗利甫和马林的传奇》,成为彼得堡大学教授。1876年他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881年当选为院士,1901年起担任俄国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分部的主席。维谢洛夫斯基在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侧重于俄罗斯与斯拉夫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而他在大学的教学工作则侧重于西欧文学,尤其是拉丁-日耳曼语文学方面的研究。他在这两方面的学识和研究都堪称博大精深,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这就为他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批判吸收各文艺学派学说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历史诗学理论体系和总体文学史的任务和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作为一门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任务与方法的提出

维谢洛夫斯基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的目的,是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他于1870年在彼得堡大学开出总体文学史课程时,开宗明义第一讲,就系统论证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提出了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即历史诗学的理论与方法。维谢洛夫斯基是在批判地总结

以往俄国和西欧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总体文学史的构想的。在19世纪上半期,严格地说来,俄国文学史作为系统化的学科尚不存在。在俄国大学里,俄罗斯语文课和俄国文学史课是合在一起开设的。直至1863年,才把总体文学教研室同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分开。随着俄国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布斯拉耶夫、贝平、吉洪拉沃夫等主持大学的文学史讲座,把神话学和历史文化学的方法论引入文学史,才发展和加强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与系统性。19世纪下半期,法、德、意等国先后在大学里开设了总体文学课程。但是,正如维谢洛夫斯基根据他多年在西欧考察的体会所指出的,这类课程无论在理论观念还是方法论上都还存在不少局限和缺陷。总体文学在德国是作为一门拉丁-日耳曼语文课开设的,局限于诠释和解读古代文本,很少涉及文学史方面的概括性的研究。在法、意等国则由于引进了泰纳等文化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原则,增强了总体文学史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具有了“诸如开阔的历史视野、文化特点的评述,历史发展的哲学概括”等优点。^①但是,由于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历史学派的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本身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如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法于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突出杰出人物、作家个人在文学、文化史上的作用,把种族、民族的因素的差异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模糊和抹煞了人类文化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等等,令人“对于这些概括的科学可靠性仍会产生一些怀疑”。^②

①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以下关于《历史诗学》一书的注释,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这个版本。

② 《历史诗学》,第35页。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要建立科学的文学史,就必须革新陈腐的、片面的文学观念,明确文学史的范围与任务,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遵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和历史的、审美的批评方法,批判地吸取西欧和俄国神话学派和文化历史学派学说中的合理因素,肯定艺术是人类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因此,必须到社会文化史中去寻找理解文学史的钥匙。早在1862年的一篇学术报告中,他就明确地指出:“各种生活事实由于相互制约而联系在一起,经济条件引起一定的历史制度,它们在一起制约着某种文学活动,而且无法把一个同另一个分开。”^①但是,他对西欧文化历史学派固有的否定矛盾斗争的历史渐进论和把自然规律同社会历史规律混为一谈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却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他强调指出:“整个历史都是‘矛盾的解决’,因为整个历史都是斗争。试着把人民孤立起来,把他们从斗争中排除出去,那时再来试着写他们的历史吧,如果还有什么历史的话。至今我们都无法相信历史现象的自然结构的可能性。历史并不是生理学。”^②

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史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他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早在六十年代开始独立学术活动时,他就明确宣告:“请告诉我,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就告诉你,人民是怎样写作的……”^③他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以卡莱尔、爱默生的“英雄崇拜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指出真正科学

① 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②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列宁格勒,1940年,第392—393页。

③ 同上,第390页。

的文化史观决不迷信任何“独来独往的豪杰”，而“敢于窥探那些至今仍站在他们身后，没有发言权的群众”。他强调说：正是“在这里应当探索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而“如今伟大人物成为了群众中所孕育的某一运动的或明或暗的反光，其亮度取决于他们对待这一运动的自觉程度，或者取决于他们付出多大精力来帮助这一运动得到表现”。^①在这里，维谢洛夫斯基不仅指出了现代历史文化学所应遵循的方向——把重心转向人民生活，从中揭示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地评价文学艺术家、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尺度，即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进步要求和进步运动的态度如何，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这也就构成了维谢洛夫斯基所构筑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史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为前提，具有面向世界，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和与此相适应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反对把文学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全人类性割裂和对立起来，认为既然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性可循，那么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艺术也必然有其共同的规律性。随着统一的世界文学的逐步形成，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及其传统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影响而孤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作为科学的总体文学史不应当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民族文学的研究，而应当

^① 《历史诗学》，第34页。

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观点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东西,从而揭示出世界文学形成和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性。

总体文学史的科学概念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就是维谢洛夫斯基大力倡导和论证的在一般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制约下,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文学过程的历史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同唯心主义美学的抽象理论和先验方法相对立的。它重事实,重实证,重归纳,着重考虑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重复性,从大量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因果性、规律性,并反复用新的可比系列来加以验证,而“这样的重复验证越多,则所获得的概括便越有可能接近规律的准确性”。^①

运用比较法研究文学现象,通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学过程中出现的雷同现象,因为在这些重复出现的雷同现象中可能具有某种规律性。但是,鉴于各民族文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在雷同现象背后可能掩盖着不同的因果关系。维谢洛夫斯基综合各派有关观点,指出出现雷同现象大致有三种情况:(1)作品起源于同一个祖先(神话说),神话学派大多持这一观点,但往往把诗歌的神话起源视为永恒不变的,从而排斥其他起源和相互影响的可能;(2)一些作品受另一些作品的影响或受同一类作品的变异形态的影响所致(移植说),但移植说的信奉者却往往排斥神话说,看不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出现雷同现象,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直接移植或相互影响;(3)作品之间的雷同可能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历史地形成

^① 《历史诗学》,第37页。

的相似的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心理结构所制约的类型学特征(自生说)。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这三种学说并不相互排斥,应当加以综合利用,使其“相互补充,携手并进”,从而为他的历史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维谢洛夫斯基依据上述社会的历史的文艺观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概念,规定了历史诗学研究的任务。他首先从文学内容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角度,指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①这就同那种把美视为艺术的必然特殊内容的先验的、唯美的文艺史观划清了界限。他接着又从文学作为一种诗歌(指艺术)形式的演变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文学史中应当特别关注诗歌的话,那么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会在这一较狭窄的范围内为文学史揭示出一个崭新的任务——考察生活的新内容,这一随着每一代新人而涌现的自由因素,怎样渗透到旧的形象之中,渗透到这些必然会体现出以往任何一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形式中去。”^②在这里,维谢洛夫斯基克服了文化历史学派片面强调文学史与社会思想史、文化史的同一性而忽视文学的特性和艺术的特殊规律的缺陷,明确地提出文学史应着重研究文学形象的诗意体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揭示艺术形式、艺术语言风格形成与演变的规律性作为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这样就把文学史的研究同诗学理论的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① 《历史诗学》,第41页。

② 同上。

三、历史诗学的理论体系与诗学范畴

西方诗学自亚理斯多德起,就一直是一种规范化的诗学。它依据古典文学范本推导出一系列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规则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模式,而并不对文学样式的起源和演变作历史的考察和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所构想的历史诗学则是对这种传统的规范化诗学的一种反拨。它“不去规范我们的趣味,而将把我们信奉的那些陈旧的诸神遗弃在奥林匹斯山上,却在广泛的历史综合中使高乃依同莎士比亚和解。”^①这是一种在广泛比较分析各民族自古至今的文学现象和过程的基础上,力求揭示人类文学艺术形成与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历史的、归纳的诗学。它的任务在于“为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为归纳的诗学收集材料,这种诗学将清除文学史的各种思辨理论,为的是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它的本质”。^②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规范化的思辨诗学体系的模式,开辟了一条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总体文学的历史研究中揭示出文学样式及其语言风格形成和演变的规律,从而阐明艺术的本质及各种诗学范畴的内涵的广阔道路。

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历史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就在于阐明“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③他依据大量文学史料的历史比较研究,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些“稳定的诗歌格式”,诸如史诗、抒情诗、戏剧等文学样式,以及情节、修饰语、韵律等艺术手段。每一代新人都用对生活的新的体验来充实和丰富这

① 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17页。

② 《历史诗学》,第42页。

③ 转引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与西方》,第109页。